

空间与人伦的“失范” ——《北京折叠》中城市伦理的症候性分析

江 涛

(汕头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摘 要:《北京折叠》中的空间分层暗含着基于社会阶层差异的不平等、不正义现实之上所建造出来的具有间隔效用的道德距离的内核隐喻,它在外围结构上构成了迈克·戴维斯所说的“布满平民窟的星球”,而在整体的形象上又可视为是大卫·哈维所研究的“巴黎城记”的汉化版。小说利用文学想象将三类社会空间按照一定的现实的城市伦理准则进行了超现实的空间折叠,即把现实中虚化的道德距离通过“空间区隔”的手段进行了艺术强化,从而揭露出了北京城从“空间”到“人伦”的双重伦理悲剧。

关键词:城市空间;市民伦理;权力与资本;《北京折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31X(2022)04-0085-08

引言

亚里士多德很早便在《政治学》中说明了城邦在道德伦理上是“以正义原则”而确立的,他指出了城市是具有伦理属性的有机体。美国学者罗伯特·派克更是认为:“城市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有机体,既是一个自然组织,又是一个道德组织”^[1],本身就象征着一一种伦理规范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自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的形式被人类所建构以来,就天然地承载着人类自身对于公平正义的伦理秩序的不懈追求,一个有秩序的城市,意味着城市的建构应该以人为本,“定位于人性化、福利和服务事业,而不是机械化和利益”^[2],它最终成为一种有序、正义、平等、可靠的稳定结构,使城市空间与空间中的市民共同朝着整体、协调、生态的方向发展。因此,城市在本质上完全符合黑格尔所关注的“伦理性的实体”,是一种有着独特伦理范式和伦理秩序的社会共同体。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现代化催生下的权力与

资本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的内驱力,对城市的空间塑形以及塑形之后所引发的市民的伦理诉求障碍,并没有使城市变成罗伯特·派克心中理想的“秩序井然的社会有机体”。随着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空间面积一方面开始大肆地对外扩张,从而导致乡土空间迅速萎缩,城乡对立的矛盾愈发凸显,另一方面,在城市空间的内部,也渐渐发生分层,黄怡曾在其专著《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中用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的分化形态来比喻,“我国社会中一个明显的上层(upper class)与下层(lower class)已经形成”^[3],这些不同的“城市地形中蕴含了许多有关社会秩序、社会控制、政治权力和文化优势的信息和线索”^[4]。所谓“空间模式与道德秩序环环相扣”^[5],不同的城市地形空间随即又延伸出了不同的人伦关系和伦理诉求,最终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伦理学视野下普遍的“非正义”“失范”的城市结构。

这种“非正义”“失范”的城市结构在新时期以来的城市空间叙事中都有过或多或少的隐性表达,只是大部分作品主要是以城市局部的物理空

收稿日期:2022-01-12

基金项目:2019年度汕头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网络‘女性向’小说研究”(STF19004);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项目“网络世代精神图谱与大众心态:女性网络写作研究”(2020CX112)

作者简介:江涛(1988—),男,湖南怀化人,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师,《华文文学》编审,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间为场域,如以具体的居住空间或是公共空间为中轴,表现辐射圈内的人与事,比如池莉、方方等人的城市小说往往是以“市井空间”为中心,表现市井小民们一地鸡毛式的日常生活;邱华栋、张欣、安妮宝贝等则把目光聚焦在了城市的“消费空间”内,用物欲横流和七彩霓虹来表现现代都市的经济属性;而陈应松、曹征路等人则更关注的是在那些流光浮影之下的黑暗角落,城市外来者们在“底层空间”的悲惨际遇……这些城市小说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城市现象和城市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具体到某一部作品中,对于城市的描写会受制于具体空间的局限,往往呈现出细处的真实图景和微观化的洞察,却难见对复杂和多元的城市有整体性把握。因此,具有鲜明的社会空间意识,将城市视为完整的社会伦理空间,表现“非正义”“失范”的城市结构和市民社会的叙事作品其实并不多见,而郝景芳的中篇小说《北京折叠》却是为数不多的、较为全面表现城市复杂性的作品之一。

科幻小说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曾获第74届雨果文学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也是继刘慈欣的《三体》之后中国第二位作家摘得这一科幻文学界的最高奖项。小说是以科幻的手法创造了一个极致化的未来北京的城市形象。时间背景大约是在22世纪,具有8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北京被分解成三个高度隔离的社会空间,不同阶层的市民分别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他们按照不同的时间比例,分配着48小时的日常生活。有人曾质疑这篇小说科幻性质的纯度不足,将之贬为“软科幻”文学,因为它没有宏大的世界观,没有逆天的科技变革,没有天马行空的乌托邦想象,甚至从头到尾也没有提及任何科学原理或科学词汇,根本就是现实社会在文学镜像中的幻影再现,无比真实,如果把“第三空间”换成回龙观天通苑(市井或底层),把“第二空间”换成金融街或CBD商务区(商业中心),把“第一空间”换成中南海(政治中心),读起来可能也会毫无违和感。当然,笔者并不打算辨析这篇小说究竟是科幻小说还是“反乌托邦”小说,而更关注小说所虚构的未来北京存在着怎样的现实的症候性?这种空间折叠的症候背后,又体现了一种怎样的城市伦理秩序?它的动因是什么?

一、空间折叠的现实隐喻与伦理批判

《北京折叠》是一部典型的都市叙事之作,空间是作者书写的基点。小说中的北京被建在一个巨大的转轴上,转轴上粘附着三层不同的生存空间:顶层空间居住着城市的统治者和管理者,他们运筹帷幄,控制着整个城市运作得井然有序;第二空间是中层精英的聚集地,他们是一群渴望升入顶层而不断努力的年轻人;第三空间则是底层的廉价劳务人员。北京城随着转轴的不断转动,翻转到地面的那一层空间里的居民便开始工作或生活,而在地下的另外两个空间里的市民则进入休眠状态——此为折叠。三个空间每48小时便轮换一次:第一空间中的市民可享受整个24小时后睡去,然后轮到第二空间的市民苏醒,他们可以享受白天的12小时时光,最后是第三空间的市民,他们再等待第二空间的人睡去之后开始起身劳作,只能享受从夜晚十点到清晨六点的时光。也就是说,生活在第三空间中的人是永远都看不见真正的太阳,那高悬于头顶上的阳光,不过是第一空间的统治阶层们利用技术手段所制造的假象。主人公老刀生活在第三空间,与5000万人挤在一起,他的工作是垃圾处理工,周遭充斥着肮脏与腐烂的气息;第二空间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精英,一共2500万人生活在秩序井然的高节奏工作中;拥有同样面积的第一空间人口最少,这里生活着北京的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制定城市规则和法律法规,人口只有500万人,仅仅是第三空间的十分之一。

《北京折叠》里的世界设定虽然具有超现实的特征,但众所周知,无论是文学书写还是现实社会,不同环境的地理空间搭配不同层级的伦理主体已经成为不可辩驳的非正义事实,而《北京折叠》以物理性的空间折叠的方式对未来的北京进行了“三分天下”式的科幻想象,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非正义性更是强化了这一事实。首先便体现在了对时间的分配上。我们知道,城市是人类进入线性时间以后,通过空间生产的方式所生成的文明结晶,当“权力领导者”和“经济指挥者”按照各自的内在需求对城市空间进行领域的划定和间隔之后,城市人就必须凭借着各自的能力(政治权力或经济资本)进入与之匹配的空间获取相应的社

会身份,从而享受与之同等的空间资源与生存权利,这便是间隔的城市空间的非正义性症候体现。但是,时间资源对于任何人而言还是公平公正的,无论身处于何种空间,拥有或高或低的社会身份,时间都不会以有色眼镜视人,时间面前人人机会均等:身处消费空间的“新富人”阶层与身在底层空间中挣扎谋生的农民工们,都能均等地拥有一天24小时的时间资源,在原则上都可自主、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可是,在《北京折叠》中,随着空间的被分野和被折叠,同时割裂的还有着人们平等享有时间的权利:顶层空间的500万人可享用最完整的24小时,剩下的7500万人却只能按照自己的阶层属性分割另外的24小时。

空间的折叠带动时间的断裂加深了城市的非正义性。城市逐渐被某种支配力量撕裂,社会阶层随着空间的折叠变得分离、固化,犹如《金融时报》所描述的那样:“城市阶层正在以物质力和行政资源调动力进行区分,分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将来虽然身处同一个城市,却熟视无睹地擦肩而过”。“居住分异”在这座折叠的城市里已是常态:第三空间的彭蠡所居住的房间只有六平米,“一个厕所,一个能做菜的角落,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胶囊床铺,胶囊下是抽拉式箱柜,可以放衣服物品”^[64],而老刀的住所是公租房,楼道里喧嚣嘈杂,时不时会有人发生争吵;第二空间里研究生秦天住的是学生公寓,“一个公寓四个房间,四个人一人一间房,一个厨房两个厕所,老刀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厕所里洗过澡”^[613];第一空间中,老葛曾带老刀住过旅馆,旅馆的房间“非常大,比秦天的公寓客厅还大,似乎有自己租的房子两倍大。房间的色调是暗沉的金褐色,一张极宽大的双人床摆在中央。床头背后的墙面上是颜色过渡的抽象图案,落地窗,白色半透明纱帘,窗前是一个小圆桌和两张沙发”^[624]。从居住的环境和条件来看,三类空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三类空间之间间隔森严,下层空间的人不能任意踏入上层空间的领域。秩序局专门负责巡视各空间的人是否安分守己,一旦有人冒着违规的风险偷渡到上层空间,被抓住后很可能就会遭遇牢狱之灾,而城市清理队则每日都会在定点空间折叠的时候,将原本应该休眠的市民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清理回家,决不允许他们多享用不属于自身层级时间的任何一秒钟。这便是一种极端化的“空间剥夺”。可以想见,在《北京

折叠》里,作者所塑造出来的未来北京完全是一个泾渭分明的等级社会,不同层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所享用的时间、空间以及社会资源均不相同。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操控着城市空间的折叠呢?

在小说中,老刀希望糖糖能上一所第三空间中能够教音乐和跳舞的幼儿园,而这样的幼儿园每月学费却高达15000元,这不是他可以支付的,于是他甘愿冒着被捕的风险“偷渡”去第一空间送密信,因为送一次便可获得10万元外快,如果带来回信便可赚到20万元。在第一空间里,伊言给老刀的封口费一出手便是10万。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万元面额的巨额纸币,而打赏给他10万元的却仅仅只是伊言工作一周的薪水,并且,伊言的老公挣钱足够多,根本不需要她上全天班,只是上半天班,拿的是半薪而已,就能有如此高额的薪水。最让老刀感到吃惊的是,她外出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仅仅只是为了不想呆在家里闲得无聊才选择出来工作。伊言与老刀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各自代表着第一空间和第三空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用图表来呈现:

空间	可支配的时间	主体的职业属性	人均月薪
第一空间	24个小时	顶层统治者	80万
第二空间	16个小时	中层精英	10万
第三空间	8个小时	底层劳工	1万

人均收入是这三类空间的市民最大的差异,也是决定空间分层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虽然是以虚构的姿态展现了一个略显荒诞的未来世界,但却依然内藏着一个不可辩驳的现实隐喻,即无论未来的北京将会经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与发展,也无法掩盖自身经济社会的本质属性,“资本指挥者”对空间资源的分配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造成贫富差异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这里便暗藏着一套经济学领域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理论对市民伦理的影响。

“马太效应”最早出自《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个故事,隐喻的是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即两极分化现象。后来这一概念被普遍用于社会经济领域,比如在股市楼市狂潮中,最赚的总是庄家,最赔的总是散户。如果不加以宏观调节,普通大众的资金就会通过这种形态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进一步加剧贫富分

化。而受市场经济控制的市民社会本身也是一个“马太效应”的实践场域。经济资本决定着竞争者们在市场经济链条中所处的先在位置。通常情况下,富裕者们会利用经济财富的优势享受更为舒适的环境、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机会,而贫穷者们则因经济劣势,在环境、教育、见识、机遇等方面被限制、被剥夺,从一开始便输在了“起跑线”上,久而久之,则会变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这便是“马太效应”所造成的两极现象。

小说中,“马太效应”与空间折叠更是完成了一种变相的“同谋”。老刀作为一个垃圾清理工,他每月的收入只有一万块,所以无论他如何努力工作,也不能和第三空间中在金融咨询公司工作的秦天和在银行实习的张显一个月的收入相比,更是无法企及第一空间里的伊言、吴闻等精英者们,因为职业属性直接决定了收入的多寡,而职业的选择偏偏又与空间的分层与折叠密切相关。研究生张显,他的人生目标是进入第一空间的政府,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愿意去第三空间生活,培养自己的管理经验,而在这之前,他想先赚两年钱,所以选择呆在第二空间的银行工作,因为银行来钱快。但第三空间的老刀即便是想挣钱也不可能有机会去银行这样的单位工作,因为第三空间仅有的工种只有垃圾清洁工、贩卖衣服食物燃料和保险,他若想挣钱就必须铤而走险。这里,我们便很容易地发现,空间折叠其实等同于一个物理性的保障圈,为不同的市民都设定了适合自身层级的下限和上限,就好比顶层空间中的人,他们的人生即便是在最糟糕的境遇,也不是老刀这一阶层的人所能够企及的,因为他们生来就有最天然的空间保障,这是他们的最低下限,却又远远超出了老刀们的最高上限,而“马太效应”只会让彼此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中可知:“不同的区域与不同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7],如果将区域视为本文所讨论的空间的话,那么在《北京折叠》中,三类空间的市民刚好便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第三空间的人每日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挣扎,会因为10%的取暖费吵得面红耳赤;第二空间的人为了个人发展努力实习,寻思着下基层培养自身经验,为有朝一日能进入第一空间而拼搏,他们的人生都是以自身生存和发展为目的。只有第一空间的人,会将多出来那十几个小时用来思

考北京的未来,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只有他们有时间思考,有权利思考,有能力思考,换言之,他们是权力的真正主宰者。“折叠”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隔离,也不仅是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权柄的集中。那些还在为今日生活艰难求生的人是没有机会去思考明日的宏大理想,那些还在为个人发展踌躇满志的人更是无暇考虑他人的未来。思考也是一种权力。当思考成为某一空间的“独权”时,空间的折叠便宣告完结,它决定了权力的中心点。

雅克·德里达曾指出:“中心的功能不仅仅是用以引导、平衡并组织结构”,而且“使结构的组织原则对那种人们可称之为结构之游戏的东西加以限制”^[8]。通常情况下,在一座城市中,权力归属地一定位于城市的中心区域,而城市的景观设计也定是围绕中心区域由近及远、由内而外形成一张巨大的网状结构,这张网按照从中心到边缘,组织起了固定的空间秩序。《北京折叠》中,三类空间虽处于物理层面上不断轮转的状态,但不难发现,第一空间其实便是城市的中心区域,是权力中心。所有的轮转与折叠,外围空间的市民们的存在与工作,都是围绕着第一空间展开。第一空间的市民不仅享有自主的生存权力,还拥有着控制整个城市运转体制的权力:白发老人能够自由控制城市折叠的时间,能够决定城市的治理方式;第二空间的研究生张显曾表达对现行体制的不满:“现在政府太混沌了,做事太慢,僵化,体系也改不动”^{[6]15},而他渴望改革的第一步便是让自己登上第一空间,即获得权力。所以,“北京空间”其实是被权力所建构起来的伦理秩序,而“折叠”则意味着权力间隙的板结。

那么紧接着的问题便是,第一空间的市民究竟是依靠着什么力量来维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小说给出的答案是科学技术。科技也是一种思考,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思考,这种思考的权力只有第一空间的人才配拥有。小说在开篇介绍整个折叠北京时就曾指出,第三空间的阳光是第一空间的人通过科技手段所制造出来的,这意味着第一空间的人是科技的掌控者,他们用科技操控维系城市秩序,相信将整个北京建造成折叠式的城市也是他们的杰作。培根曾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自然包含了科学技术,而“力量”(power)亦可译为权力。所谓权力,简单地说便是

控制社会、控制他人的能力,而科学技术往往能够作为工具实践这一作用,就好比吴闻的自动化垃圾处理技术,如果真的被广为推广,便能对现有的城市空间和社会结构造成天翻地覆的影响,而权力的作用,便在于最终决定如何控制和使用科学技术。

总而言之,《北京折叠》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奇的未来世界,作者以科幻之名,将原本平面化的北京空间折叠成立体化的空间形态,并最终影响着城市的发展以及市民的生存和生活,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仍然是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力量,对城市的控制和塑形。空间折叠的背后是空间的隔离与社会阶层的板结,这与当下平面化的都市结构并无差别,反而强化了城市的非正义性,它直接暗示了小说的现实属性:折叠的空间隐喻着当下的现实,同样也警醒着人类的未来。

二、重叠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矛盾的市民伦理诉求

从城市的空间设定来说,《北京折叠》中的北京与大卫·哈维笔下“现代性之都”巴黎,均呈现出了结构上的雷同性,即空间分配的不公所引发的城市伦理的失序。尽管前者是立体化的,后者是平面化的,但都相继出现了诸如“居住分异”“空间剥夺”等公平公正缺失的社会现象,违背了城市正义的伦理诉求,所以我们可以认定,《北京折叠》其实是一篇批判现实主义之作,作者也曾表示,“到目前为止,对不平等的宣战还未曾取得真正的胜利”^[9],鉴于此,确实有人认为这部作品其实“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现实主义寓言”^[10]。

所谓“反乌托邦”(Anti-utopia),又称为“恶托邦”“废托邦”或“敌托邦”,它是相对于乌托邦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指充满丑恶与不幸之地。我们知道,伦理学的终极目标是引领人类走向最终的善与幸福,而人类对善与幸福至始至终的求索,即文明的发展,可视作为一种追求乌托邦的过程。可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厚积薄发,这场对乌托邦的追求所换来的结果却让人始料未及,愈发地走向了它的反面,即“反乌托邦”的呈现。科学理性、政治权力、资本经济等这些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曾被视为是追求乌托邦的工具,却最终没能拓宽人类精神的疆土,使人类洄

渡到最终的幸福彼岸,反而以更隐匿的方式异化了人类自身,使人类遗忘了真正的幸福,却以获得“工具”本身为幸福。在“反乌托邦”化的社会中,隐藏着各种难以控制的弊端,如阶级矛盾、资源紧缺、司法混乱、德性缺失等。人类的精神在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中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反而面临着一个令人失望乃至绝望的齐泽克所预言的“启蒙的绝境”。

我们确实可以将“折叠的北京”视为一个近似于“反乌托邦”化的城市。从整个社会背景来看,由于城市化进程所引发的人口巨增和生存环境的急速恶化已经让城市变得不堪重负,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代替了人工劳动力,又间接导致了大量失业现象的频发,“以正义为原则”的“秩序井然的社会有机体”已经变得渐行渐远,甚至岌岌可危。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就业压力和城市发展的压力,第一空间的政府和专家们决定推行360°空间折叠计划,采取空间隔离的方式控制着城市秩序有条不紊。事实上,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反乌托邦”的表现。且不说整个城市的公平公正原则已经无从谈起,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折叠的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完全被镶嵌在空间内,市民们被类化为支撑整个城市空间运作的零部件:第一空间的市民是整个城市机器的中枢,第二空间的市民则是维系机器运作的零件,而第三空间的人所生活的空间地带是远离科技、权力、经济领域的城市外围,是被城市放弃的废弃零件,他们的人生价值对于整个城市运作的意义几乎可有可无。因此,从人与城市的关系来看,尽管这座城市是由第一空间的掌权者们精心设计并由第三空间诸如老刀父亲这样的底层劳务员工所建造,但整个城市的伦理机制却最终没有导向一种人性的交流与对幸福的诉求,而是走向了一种机械性的“间隔治理”。在这种治理关系中,平面的城市折叠成立体空间,从而阻断了人类的交流,而科技对人力取代,也修改了对人的价值的判定,折叠的北京彻底被打造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反乌托邦”城市,如同福柯所提及的圆形监狱,权力领导者通过对空间的掌控,将“可被限制、使用、转化与改进的驯良身体”^[11]变成整个空间系统中各部分所需要的零部件。

我们知道,生存问题是每个现代人必须面临、追求、实现的伦理诉求,而城市作为市场经济与现

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必须以最大程度的公平公正满足市民所理应拥有的生存权利。然而,已经沦为“反乌托邦”城市的折叠北京,在整个城市的运转机制上却并不符合人性需求,而是依靠着科学技术实现的机械性治理维系着有条不紊的外表。因此,以常理判断,面对一个机械化的、非人性的“反乌托邦”城市,内部理应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激化与阶层冲突,可是,细读文本却可发现,小说在“对不平等的宣战”的同时,其实又宣扬着一种认同、妥协与沉默的伦理姿态,在“反乌托邦”的内部生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乌托邦”之都。

老刀作为一个在第三空间中以垃圾处理为生的市民,从父辈开始就在为这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付出辛勤的劳动,可是由于地处底层,月薪只有1万的他已过不惑之年却依然单身,过着不体面的蜗居生活,在垃圾站附近收养了被遗弃的孤女糖糖,却又无力支付糖糖上幼儿园的学费和舞蹈课的费用,只能铤而走险以偷渡的方式进入上层空间赚取学费。老刀的人生几乎充满了悲剧和磨难,而这一切的根源不过是在于空间折叠对主体最基本的伦理诉求的限制与规劝。但是,让人不解的是,老刀却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抵抗的心理与行为,甚至连质疑都未曾有过,反而甘之如饴地认同着他的工作、生活。“他是个垃圾工,做了二十八年垃圾工,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一直做下去。他还没找到可以独自生存的意义和最后的怀疑主义。他仍然在卑微生活的间隙占据一席”^{[6]10-11},他甚至“并不嫌弃自己的工作”,尽管他每天都需要“面对垃圾传送带上如溪水涌出的残渣碎片,从塑料碗里抠去吃剩的菜叶,将破碎酒瓶拎出,把带血的卫生巾后面未受污染的一层薄膜撕下,丢入可回收的带着绿色条纹的圆筒。他们就这么干着,以速度换生命,以数量换取薄如蝉翼的仅有的奖金。”^{[6]12}不单是老刀,在整个第三空间生存的5000万人亦是同样如此,他们表现出了对自己生存现状的无比认同,让原本一个残酷的、非人性的“反乌托邦”之都又充满了一种乌托邦式的井然秩序。

不仅是第三空间的市民,即便是在第二空间的张显、秦天,他们也都爱岗敬业,对工作表现出最大的热忱,对整个城市的折叠体制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秦天深爱着第一空间的有夫之妇依言,而依言也对他心生爱慕,可是秦天却从不敢踏入第一空间对依言表白,只能花钱请老刀代为送信,由

此可见,在他的心中,哪怕是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不能让他赴汤蹈火敢于穿越空间的阻隔,这表明了他的主体意识绝对认同现有的折叠体系。他的同学张显,曾对老刀表示过对现有的折叠体系的不满情绪,但也从未想过要以激进的方式彻底打破它,而是选择以合法的方式(先在银行挣几年前,再去第三空间积累管理经验,最后进入第一空间的政府部门)进行改良,而这种改良却可以更好地维系折叠北京现行的伦理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又确实在一个非人性化的“反乌托邦”城市中建构了一个实实在在、和谐稳定的“乌托邦”世界:市民们安分守己,恪守义务,在规训的伦理道德体系下努力工作,以获取在城市中的生活资源和生存权利。因此笔者大胆判断,这部小说所建构的未来北京,混合着“反乌托邦”和“乌托邦”的双重影像,它的内里实则表达了一种矛盾的伦理诉求。

那么,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作者又是如何将“反乌托邦”和“乌托邦”毫无痕迹地重叠在一起呢?答案是北京折叠中特有的空间晋升制。小说中的老刀曾考过三次大学只因没有考上,才子承父业做了几十年的垃圾处理工,因此在他的观念里,接受好的教育是空间晋升的正途,所以他想尽办法挣钱也是为了让养女糖糖能够进入最好的幼儿园,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最终获得美好人生。当然,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能直接从第三空间升入第一空间,那便是通过入伍转业的方式在第一空间中谋求一份职业,比如五十多岁的老葛,他以前也是第三空间的人,“十五岁的时候考上了军校,后来一直当兵,文化兵,研究雷达,能吃苦,技术又做得不错,赶上机遇又好,居然升到了雷达部门主管,大校军衔。家里没背景不可能再升,就申请转业,到了第一空间一个支持性部门,专给政府企业做后勤保障,组织会议出行,安排各种场面”^{[6]25},可是通过这种方式的空间晋升,最终获得的不过只是一个“高级蓝领”的称号,难以真正改变第三空间的阶层属性。而第二空间的人也有着属于自身的晋升方式:在好的企业部门工作或实习,累积经验,表现优异者自然可以晋升,获得第一空间的社会身份。这样的晋升制表面上不起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索,但实际上却起着美化“反乌托邦”,稳定阶层固化,缓解城市不公平、不正义原则对市民伦理的制约和危害的效用——城市掌权者并非冷酷霸道,他们给了中下层市民获得公公平

等的晋升机会。正因为严酷的空间隔离与折叠背后,权力阶层预留了一座中小阶层晋升的“独木桥”,所以他们即便意识到城市存在着严重的不公、自己的生存权利被侵害,也只能默默接受这样的现实,然后暗自发愤图强,于是,一个看似和谐稳定的乌托邦城市便应运而生。

结语

事实上,从每一个现代市民个人化的伦理诉求来讲,折叠的北京虽存在着诸多社会性问题,足以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老刀经常以“操蛋”这样的脏话表达对社会的不满,而张显也曾表达过渴望改革体制),甚至是成为激化革命的诱因,但有趣的是,它又的确发出了一种相对的“领域正义”的吁求。

所谓的“领域正义”是城市规划师 Bleddyn Davies 在《社会需求和当地服务资源》中所提及的概念:“领域正义是与社会政策、福利制度紧密相关的一种社会正义。Bleddyn Davies 将领域单元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而不是根据人口规模)进行划分,提出规划应该满足领域正义,即满足每个领域单元的社会需求”^[12],也就是说,当索亚的空间正义或是大卫·哈维的社会正义已经被确定为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乌托邦后,便需要依靠政治权力在不同利益的主体之间寻求一个相对的平衡,从而退而求其次,以满足各个空间和阶层的“领域正义”的实现,所以便有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科层制”^①,而《北京折叠》中所描写的北

京城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科层制的现代社会。在一个合理的科层化社会里,虽然人们经济水平、社会地位有高低,但社会大体是公正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层级差别或者差距并不会引发人们的极度焦虑,在小说中,作者巧妙设定的空间晋升制,便是这严酷的“科层制”社会合理化的内因,所以,本应在城市中极有可能引发的矛盾冲突却始终相安无事。

但是,如果从批判伦理学的角度来说,整个城市的运行机制和伦理体系并非导向善和幸福,而是导向恶与不幸。北京的空间分层结构并非是良好的“橄榄型”或“纺锤型”结构,而是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型社会,代表着社会底层的第三空间的人口比例十分庞大,它所造成的结果是,由极少数人组成的上层集团,掌控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并且锁定了社会发展路径。无论时代如何改革与发展,都不会改变这个结构,反而使得结构中不同阶层的差距不断扩大。虽然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结构从转型到定型是常规化的,但是这种发展其实违背了公正公平的原则,而呈现出一种畸形化的定型。而郝景芳最终也没有下定决心要去获取一场“对不平等的宣战”的真正胜利,她的立场是保守而非先锋的:默认城市空间不正义的隔离与折叠,却不宣扬从本质上解决不正义现实的反抗和革命;强调集体价值的共识和认同,也认同通过个体努力来实现个人价值的意义。总之,在《北京折叠》中所体现出来的城市伦理,充满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注释:

- ①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科层制是指,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作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只有到了理性化时代的科层制社会,

这种等级数目化的想象才如此自然。社会科层化使得人们感觉到等级的无处不在,并将之内化为自身关于个人能力的等级意识。

参考文献:

- [1] 康少邦,张宁.城市社会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16.
- [2]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441.
- [3] 黄怡.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111.
- [4] 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M].郑娟,梁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54.
- [5]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3.
- [6] 郝景芳.北京折叠[C]//孤独深处.南昌:江西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25.

- [7]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52.
- [8]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02-503.
- [9]郝景芳.我想写一本《不平等的历史》[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5ddec80102w8qp.html. 2016.09.13.
- [10]张婧.是折叠北京还是折叠焦虑[J].名作欣赏,2016(35):147-148.
- [1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287.
- [12]张京祥,胡毅.基于社会空间正义的转型期中国城市更新批判[J].规划师,2012(12):7.

Space and “Anomie” of Ethics: Symptomatic Analysis of Urban Ethics in *Folding Beijing*

JIANG Tao

(College of Arts,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Abstract: The spatial stratification in *Folding Beijing* implies the core metaphor of moral distance with spacing effect based on the unequal and unjust reality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That constitutes what Mike Davis calls “a planet full of civilian caves” in its peripheral structure. In the overall image, that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Paris city” studied by David Harvey. The novel uses literary imagination to fold the three types of social space into surreal space according to certain realistic urban ethical standards, that is, that artistically strengthens the virtual moral distance in reality by means of “space separation”, so as to expose the dual ethical tragedy of Beijing from “space” to “human relations”.

Key words: urban space; civilian ethics; power and capital; *Folding Beijing*

[责任编辑:资丽君]